

廣交會與中國的對外開放

• 何 慧

在冷戰中東西方對峙的形勢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完全是國家政治的工具，一直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對外貿易既是國家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也是對外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廣交會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窗口。然而，隨着冷戰格局的巨大變化，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特別是1972年中美關係初步改善、中美貿易拉開序幕之後，在廣交會上高度壟斷的外貿體制悄然改變。在一貫的政治掛帥和國家意志之外，市場意識開始萌發，成為中國最終拋棄舊體制、迎接新時代的微弱卻清晰的前兆，也是中國的市場由封閉走向開放，產品由匱乏走向豐富，國力由弱小走向強盛的開端。這一歷程折射出中國對自身及外部世界認識的變化，留下了冷戰轉型過程中中國逐漸融入世界的痕迹。

從70年代初開始，特別是中美貿易拉開序幕之後，在廣交會上高度壟斷的外貿體制悄然改變，成為中國最終拋棄舊體制、迎接新時代的微弱卻清晰的前兆。

一 統一對外，意識形態為先（1956—1965年）

新中國成立以後，對外貿易基本上是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平衡項目。進口的是國內經濟生產環節中短缺的物品和彌補不足的商品，出口則是為了支付進口而進行創匯。

1956年11月10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在廣州舉辦了首屆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1957年4月25日，中國國營進出口企業在廣州聯合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自此，每年春、秋兩季的廣交會就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窗口。廣交會最初只是進行商品出口洽談，從1959年秋季以後開始兼營進口交易。

1958年，針對對外貿易對外不一致的「混亂現象」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傾向」，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對外貿易必須統一對外的決定〉，明文規定：「對外貿易必須嚴格統一對外，絕不容許有任何不統一現象發生。……只有統一對

外，才能有計劃完成國家進出口計劃並為國家生產建設服務，才能有計劃、有組織地同兄弟國家進行貿易協作，才能配合我國和平外交活動，特別是才能同國外資產階級進行強有力的政治經濟鬥爭，在防止和抵制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經濟腐蝕或侵襲上體現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①這裏所指的兄弟國家主要是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和亞非拉友好國家。這些規定完全是從意識形態和政治需要出發的人為劃線，而不是經濟活動的準則。從建國初期到60年代，這種高度統一、嚴格控制的情況不僅沒有絲毫改變，而且在不斷強化。

1965年頒布的〈國務院批轉對外貿易部1965年全國外貿工作會議紀要〉，強調外貿部門「既是經濟部門，又是外事部門，……在一切工作中做到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掛帥，中央政策掛帥，統一對外。」外貿部門要「堅決貫徹執行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和國別貿易政策，支持堅持馬列主義的兄弟國家，支持亞非拉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開展對第二中間地帶的工作，密切配合外交活動，加強反帝反修鬥爭。」^②由此可見，外貿完全是政治和外交的配角。

在政治主宰一切的時期，雖然隨着生產發展，貨源有所增多，要求擴大出口，但面對困難不少，那就是：「貨源雖多，市場不好」，或「雖有市場，貨不對路」。因為中國的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閉門造車，完全不了解世界市場的行情，又沒有暢通的銷售途徑。一年兩屆的廣交會成交額佔了外貿公司全年出口任務的三分之二，因此，廣交會對各進出口總公司完成全年任務具有決定意義。當時的解決辦法是：狠抓統一，反覆教育，發揚互諒互讓風格，統一運用資源，如用廣東的暢銷茶帶動上海的滯銷茶。又提倡「三交底」：互交貨單家底，互交客戶安排和準備成交數量底，互交品質價格的底；「五統一」：統一運用資源，統一安排客戶，統一調配幹部力量，統一作戰布置，統一看法。還強調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學習毛主席著作，重申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線，是全盤工作的基礎^③。

雖然在對外貿易中一直是政治優先，但這個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尚能基本維持國家對外匯的有限需求，直到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才使最基本的對外貿易活動幾乎無法正常進行。

二 政治掛帥，登峰造極(1966—1970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行各業逐漸受到衝擊。1967年的春季廣交會受到文革的直接影響。4月初，有匯報說廣州的情況緊張，軍管會難以控制，很可能使廣交會無法在4月15日開幕。為了不使廣交會中斷，4月14日清晨，周恩來乘專機從北京飛到廣州，安排1967年春季廣交會，並與各山頭的造反派見面，說服他們顧全大局，從而保證了廣交會如期開幕^④。

廣交會雖然如期舉行了，但是這屆廣交會的政治氣氛極其濃厚，強調「交易會」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人人都要成為既是交易員，又是毛澤東思想紅色宣傳員。……特別要大張旗鼓宣傳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進入新階段的重大政治意義和國際意義，從而擴大

在60年代中期，雖然隨着生產發展，貨源有所增多，要求擴大出口，但面對困難不少，因為中國的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閉門造車，完全不了解世界市場的行情，又沒有暢通的銷售途徑。

國際反美反修統一戰線。」要區別對待客戶，「凡在政治上靠攏我們的客戶，要支持、鼓勵，對表現不好的客戶要進行教育。」^⑥這樣就把經濟貿易活動的場所，變成了政治鬥爭的舞台。在進行商務洽談前後，廣交會要組織參加者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交換意見、讀毛主席語錄、唱革命歌曲等，參觀訪問的目的也是要加深對文革的認識。

1967年的秋季廣交會開幕前夕，周恩來又再次直接干預。9月13日，廣州兩大造反派衝擊並佔據軍區大院，周恩來對他們的行為「大為震怒」，立即召見其在北京的代表，強調必須盡快恢復秩序，以便抓革命、促生產，並指示：「廣州的交易會不能停開。」^⑦廣交會總算是順利開幕了，但政治活動比以往更多，甚至在商業談判中雙方都總要手持毛主席語錄。甚至「據說有些日本商人故意把語錄本弄髒，看起來是經常讀過的，好贏得中方的好感。」^⑧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達到高潮的1968至1969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宣傳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被當作是廣交會的主要任務。而且強調廣交會「是國際範圍階級鬥爭的前哨陣地，鬥爭十分尖銳複雜。因此參加交易會的人員必須是政治上可靠的。」^⑨在這種情況下，各交易團紛紛大搞政治活動，進行了大規模對外宣傳活動，還對客戶摸底調查，之後對客戶分類排隊，區別對待，確立重點宣傳對象，進行重點宣傳^⑩。廣交會的經濟活動幾乎完全被政治狂熱所掩埋。

對外貿易部政治部專門編印了〈1969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工作方案〉，要求組織參加交易會人員學習，並制訂具體的宣傳文稿。〈方案〉強調：「交易會是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參加交易會的全體工作人員，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堅決把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當作首要任務。」宣傳形式上要「三突出」（即突出毛主席光輝形象、突出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突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鬥爭路線）和「三顯示」（即顯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顯示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顯示用毛思想武裝起來的人的作用）。具體做法包括開座談會、個別走訪、演出樣板戲，統一訂制贈送外賓的毛主席像章等^⑪。

由於文革的干擾，1968年秋季廣交會的成交額顯著下降。因此，1969年的廣交會提出要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造謠言說我們文革後沒有東西了」而「貶低我文革的偉大意義」做出回應，即在1969年春季廣交會上提出改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貿易的做法。雖然仍然強調統一對外，同一商品必須由一個交易團或總公司實行對外統一經營、統一報價、統一談判、統一成交，統一對外簽訂合同，但對於價格的高低可以根據不同商品、不同市場定價，並允許給予中間商大約5%的佣金^⑫。這是廣交會首次進行的有限改革。

1969至1970年是冷戰轉折的關鍵年份，中蘇關係跌至低谷，中美關係微妙復蘇，但這些還未直接反映到經濟領域。1970年的春季廣交會在政治上仍然強調「三突出」和「三顯示」。總之，政治和外交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但與此同時，恢復因為文革而遭破壞的經濟秩序也是周恩來的努力方向。4月26日，周恩來審查第二十七屆廣交會展館方案，並做了「外貿要促生產、促內貿，促生產、使用、科研相結合」的重要指示^⑬。可以說，從這時起，中國的形勢開始悄然變化。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宣傳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成為廣交會的主要任務。廣交會的經濟活動幾乎完全被政治狂熱所掩埋。

三 抓住機遇，力求變革（1971—1972年初）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中蘇分裂之前，中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佔了整個對外貿易的絕大部分，但是，到70年代初，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約佔中國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三，涉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從外貿的角度看，已經沒有了冷戰初期的營壘分明。對此，1971年3月，對外貿易部召開了全國外貿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貿易的若干具體政策和做法〉，強調「對外貿易是對外戰線的重要方面，必須緊密配合外交活動和外交鬥爭，為我國的對外政策服務」，仍然是把對外貿易與國際政治鬥爭聯繫起來，但是也提出要利用矛盾，並換取重要物資，加強國防、三線建設，促進工農業生產^⑬。

到70年代初，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已經沒有了冷戰初期的營壘分明。雖仍然是把對外貿易與國際政治鬥爭聯繫起來，但是也提出要利用矛盾，並換取重要物資，加強國防、三線建設，促進工農業生產。

相對於1969年8月對外貿易部〈關於對資本主義國家（地區）出口貿易做法的試行規定〉，這個文件明確了出口商品應按國際市場價格作價的原則。對於收匯問題，提出在注意安全收匯的前提下，可以靈活處理；對於出口商品的品種、規格、花色等也有一些修改。具體措施中還是強調「以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為綱」，但提出要貫徹執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抓革命，促生產，繼續搞好鬥、批、改。這是繼1969年春季廣交會上提出改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貿易的做法之後的又一次改革。這些都與周恩來的不懈努力分不開，他在文革的不利形勢下艱難地推動有限的突破。1971年6月，周恩來在接見出版會議領導小組成員時，專門談到工藝品出口的問題。他說，風景圖片不能算「四舊」；石頭刻圖章是廢物利用；假古董明明白白地賣給外商可以收外匯，用來支援世界革命，有甚麼不好^⑭？周恩來在這段時期千方百計地促進對外貿易，可謂用心良苦。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突然宣布即將訪華，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對各國的經貿人士更是一個極大的震動，他們紛紛向中國作出願意發展貿易的表示。中國方面，8月25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外貿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由李先念副總理直接領導召開的。會前，周恩來和李先念都多次作出重要指示。7月26日周恩來同李先念談到外貿問題時說：「現在一年才進出口四十多億美元，太不像話了，請先念、秋里同志抓一抓。」^⑮再次強調外貿工作的重要性。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新關係。在這之後，許多國家加強利用香港對中國進行觀察和接觸。美國也在香港增設研究機構，研究中國的貿易情況，並積極開展同中國駐港機構的聯繫，幾十家美商來到香港探詢對華貿易。當時在港美資企業超過五百家，也都在加強機構、增加人員、擴大建築，希望同中國做生意。他們邁出的第一步就是參加廣交會。對此，對外貿易部於1972年3月專門發了一份關於中美貿易的文件，將中央為中美貿易確定的原則下發給業務部門，總的原則是「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開展對美國的貿易」，要求步子不要一下子邁得太大，要根據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政治鬥爭的需要來定，出口可以廣泛一些，進口則「應從嚴掌握」。該文件還決定邀請三十到四十名美商參加這年的春季廣交會，優先選擇那些對中國態度友好，一貫主張開展中美貿易並為此作出過努力的進口商，適當考慮包括壟斷集團的代表和能為中國引進先進

技術的出口商。該文件同時也提出，原則上可以同第三國的美資公司和美國子公司做貿易。不過，所有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暫時一律由總公司統一掌握^⑥。

1972年的春季廣交會的指導方針是貫徹落實周恩來總理關於外貿要促生產、促內貿、促科研的重要指示，落實「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因此出現了難得的好勢頭，文革氣氛淡薄了許多。雖然這是文革後第一次比較正常的經濟貿易活動，但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如這一屆廣交會客商人數空前，但貨源不足，出現了供不應求的矛盾；在接待方面，一些人態度簡單、生硬、甚至粗魯，使一些客商很失望。

除了在邀請客戶方面增加了邀請美國商人和美國在第三國的商人外，廣交會又有一項新的改革，即亞非拉國家國營公司代表或官方人士參加廣交會的費用，由過去全包改為原則上自理。如對方確有國難，從政治上、業務上考慮有必要者，其在中國國內的費用可由中方負擔，個別需由中方負擔單程或往返機票者，應報批准^⑦。這也是在走向與國際慣例接軌。

四 中美貿易，緩緩起步（1972年秋—1974年春）

1972年春季廣交會上，中國方面第一次邀請了三十多戶美國客商參加廣交會，人數雖然不多、且大多數是為了調查、試探和建立關係的目的而來，但直接出口成交也達到了四百多萬美元。比較大宗的商品是生絲、棉胚布、服裝、地毯、煙花炮竹、香料油、凍對蝦、鎊、錫以及工藝品，由此初步恢復了中美貿易。中美貿易的中斷是冷戰造成的，中美貿易的恢復實際上是對冷戰格局的極大衝擊，甚至可以說，在經濟的意義上冷戰已經基本結束了。

從這次中美直接貿易的情況看，中美貿易中斷了二十多年，雙方的隔閡較深，彼此的了解需要一個過程。美國的歧視性關稅是當時中美貿易的主要障礙之一，但中國方面也有供貨品種少、數量少的問題，中國的業務人員對美國市場所需商品的品質、規格、花色、包裝、標識等也都缺乏了解，這暴露出中國的外貿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業務人員不僅對美國貿易缺乏知識，一般國際貿易的基本知識也很貧乏。開展中美貿易，要求雙方增進了解，也必須從各自的內部出發，採取措施去適應新的形勢。1972年5月31日，廣交會經外貿部報請國務院同意，在廣州擴建交易會展館，擴建面積近十萬平方米，比原展館大五倍多。這也是一個適應新形勢的舉措。

1972年秋季廣交會是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尼克松訪華、中國與日本及聯邦德國建交之後開幕的。由於中國的國際威望日高，建交國增多，因此貿易要求量增大；但一些商品的生產不適應形勢的發展，貨源不足，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在實踐中，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廣交會是國際貿易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方面亦開始學習如何適應國際市場價格變動而進行貿易結構的調整。對於那些中方有較大發言權的商品，有些公司通過摸清市場情況，提高價格，走到了市場的前面，並改變了過去的商品按照「成本加利潤」決定價格的做法，改為因應市場和客商的需求定價。例如，按照靈活調價、看貨議價的做法，一塊重量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新關係。對外貿易總的原則是「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開展對美國的貿易」，要求步子不要一下子邁得太大，要根據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政治鬥爭的需要來定。

不到200斤，成本僅100多元人民幣的園藝石，賣了2.2萬元人民幣，就是活生生按市場定價格的例子；這也使人們逐漸意識到，必須要掌握世界市場的基本供求情況，才能把生意做好做活。於是，廣交會成了學習世界市場知識的課堂。

1972年10月29日，周恩來總理對〈1972年廣州秋季交易會安全工作情況匯報〉作批示：督促實行，帶頭示範，嚴格檢查，有過即改，善始善終。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第630期以「廣交會住房緊張，交通工具不足，引起外商不滿」為題，對於這屆廣交會的情況進行了報導。11月2日，周恩來批示：三件事情非解決不可，提出由北京、天津、上海臨時調一些轎車到廣州，司機隨車調用；住房不足，可借用機關、學校，特別是要有像樣的廚房；飯館不夠，可以將茶室改作飯館^⑧。這些臨時性的措施雖然能解燃眉之急，但並非長久之計。對外貿易的需要由此帶動國內其他行業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變革。

1972年的春、秋兩季廣交會共邀請了180位美國客商參加，恢復並逐步開展了中美貿易。1973年，外貿部根據中央批准的對外貿易的原則精神，確定了新的對美貿易原則，總原則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繼續開展同美國的貿易」，並計劃1973年的貿易額略高於1972年。對進出口的掌握上，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品種可適當放寬，除了主要選一些先進機械、成套設備、先進技術，特別是石油化工、電訊、電子方面的設備和優良種籽、種畜外，中國也將根據國內需要和有利的價格條件，適當直接進口糧食、棉花、化肥、廢鋼、鋼材、高級煙葉、油脂油料等。對於進口金額較大、數量較多的項目，需報請國務院批准後進口。對美出口應適當增加，以擴大影響，多出口輕紡產品、手工藝品和土特產品。對於參加廣交會和互訪問題，則提出1973年的廣交會可擴大邀請美商的名額。至於航運問題，由於預計1973年的中美貿易貨運量將有所增加，繼續中途轉運費率高、需時長，很不經濟，希望能盡量使用第三國船隻開關直達運輸。對美進口貿易，暫由總公司統一掌握，統一對外成交簽合同^⑨。至此，中美貿易的基本形態得以確立。

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了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在周恩來病重時，鄧小平挑起了恢復經濟和國家秩序的擔子，在全國進行挖潛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整頓企業等經濟工作。在中美關係緩和、越南戰爭基本結束的形勢下，中國的國內經濟開始轉向。

1973年，外貿部還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例如，對於旅客攜帶和個人郵寄進口少量自用的印有「美國人民捐贈」字樣的物品和包裝用品，不再作為印有「反動字樣」的物品予以沒收，各海關可以放行。對於來自建交國和美國的外籍華人也以一般旅客對待。對於美國人訪華後寫的觀感和有關中國情況的書籍、文章，需在發表後把作品寄給中國有關單位的接待人員，除了有明顯歪曲、誣衊的內容外，海關可予以放行。對於美國進出口貨物和貨樣、廣告品，不再向海關填報總公司的合同號，而只需憑各口岸外貿公司向海關申報的進出口貨物明細單查驗放行^⑩。換言之，中國不再把美國視作敵人來對待。

總之，1973年出現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好勢頭，在中美關係改善的帶動下，到1973年底，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達到156個。經濟上的冷戰格局已經打破了。

1972年秋季廣交會是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之後開幕的。由於中國的國際威望日高，建交國增多，因此貿易要求量增大；但一些商品的生產不適應形勢的發展，貨源不足，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五 一波三折，步履艱難(1974年秋—1976年)

然而，1972和1973年中國對外貿易出現的好勢頭沒有持續下去，很快便出現了反覆。1974年2月18日，外貿部外貿調研組對1974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貿易形勢做了詳細分析，認為這是資本主義世界極其混亂和動蕩的一年，年初西方金融貨幣危機加劇，年中出現因世界性農業歉收而造成的糧食、食品供應的嚴重緊張，年末爆發石油危機。在這種形勢下，必須密切注意國外市場的變化，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選擇有利時機和貿易條件，做好進出口工作^②。

1974年4月15日，春季廣交會遷入新展館舉行。雖然政治大氣候強調批林批孔，但中央仍然堅持抓革命、促生產，趁中國出口商品價格較高時，爭取早出口、多收匯。但是，這屆廣交會受到「四人幫」的嚴重干擾，他們在工藝品題材問題上首先發難，提出：反動、黃色、醜惡的工藝品(包括尊孔反法、宣揚孔孟之道)和以神佛鬼怪、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封建迷信為題材的工藝品一律不能出口，而對於以古代神話、故事、人物為題材的工藝品要作具體分析等等。結果，經審查不合規定的工藝品有150多個品類，包括35種美術陶瓷、廣彩、木刻和畫類，全部未展未賣。極左陰霾一度籠罩整個廣交會。

但是1974年秋季廣交會還是進行了兩項重要改革。一是對參加廣交會的外國官方代表團和商人一律改為自費，改變長期以來由中方負擔費用的做法。對此，外賓普遍贊同，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二是減少宴請活動^③。這是廣交會力圖淡化政治色彩所作的努力，也使其經濟活動的特徵日益明顯。1974年11月，外貿部下達了〈關於1975年改進外貿經營體制的意見〉，對於已經具備條件對港澳地區直接辦理出口、發運、結匯的省、自治區外貿分公司，提出可試辦少數幾種商品的出口業務，以便取得經驗，逐步發展^④。

1975年1月，籌備已久的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周恩來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這次會議上，朱德繼續當選為全國人大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十二人為副總理，四人幫的組閣陰謀破產。1月25日，鄧小平先後在軍隊和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管工業書記會議上，提出進行整頓，之後，各行各業開始大力抓經營管理、訂定規章制度、抓產品質量、抓勞動效率，國內呈現了多年來少有的穩定和活力。

1975年春季廣交會的指導思想是：「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⑤。這年春季廣交會進口成交總額達四億美元，進口商品成交額是歷屆廣交會較多的一次。成交的商品絕大部分是由當時國內生產建設、市場供應，外貿加工出口所急需的原料和材料，包括鋼材、鋁錠、鉛、廢鋼、化工原料等^⑥。1975年秋季廣交會以「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為綱」，同時提出要貫徹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的基本精神，以及中央關於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兩步宏圖^⑦。1975年10月5日，外貿部發出〈關於認真抓好出口商品質量的通知〉，要求把質量放在第一位，抓好出口商品質量，重合同，守信用，把好質量關^⑧。這屆廣交會總共接待了來自110個國家和地區的來賓，共22,778人次到會洽談貿易和參觀。其中美國商人705人次，日本商人2,690人次，出口成交達14.19億美元^⑨。

1974年秋季廣交會進行了兩項重要改革。一是對參加廣交會的外國官方代表團和商人一律改為自費，二是減少宴請活動。這是廣交會力圖淡化政治色彩所作的努力，也使其經濟活動的特徵日益明顯。

然而，1975年鄧小平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嘗試很快受到極大阻力。1976年初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鄧小平恢復秩序的努力付諸東流。1976年春季廣交會又出現了政治掛帥的現象，提出此次廣交會的主題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堅持貿易平等原則、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側重打擊蘇修。這是打倒四人幫之前的最後一次廣交會，也是70年代以來最左的一次^⑨。政治上的起伏影響到外貿工作，「左」的思想不是一時間能徹底清除的。

1976年的秋季廣交會是四人幫倒台後的首次廣交會，一方面，政治的氣氛很濃厚，主題是繼承毛主席遺志、揭批四人幫，仍然繼續深入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但另一方面，強調繼續貫徹統一對外的方針，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發展對外貿易，注意價格趨勢。接待客商人數有較大增加，但不少產品仍然供不應求。

1976年開始出現各總公司辦的「小交會」，即專業型的小型交易會。它們的優點是，到會的專業商集中，能促進競相購貨；洽談時間充裕，展出面積大；有利於國際市場調研。外貿部提出對於出口商品的原材料、輔料和包裝物料，原則上要立足國內，但經過認真計算和審查，對中國有利的話，也可以接受國外商人提供一些補充性的原材料、輔料和包裝物料，加工進口。可以看出，中國在政治上還未完全擺脫左傾思想和冷戰思維束縛的情況下，在經濟上已經開始為未來校正方向。

1976年的秋季廣交會是四人幫倒台後的首次廣交會，一方面，政治的氣氛很濃厚，但另一方面，廣交會強調繼續貫徹統一對外的方針，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發展對外貿易。

六 衝破樊籬、走向開放(1977—1978年)

1977年的春季廣交會體現出轉折時期的矛盾，一方面提出大幹社會主義，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另一方面，在「兩個凡是」思想下，突出政治上緊密團結在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狠批四人幫，捍衛毛主席偉大旗幟，實現所謂「抓綱治國」戰略^⑩。一方面表示要堅持對外貿易的平等互利原則，但另一方面又注重在出口成交中「本着團結第三世界和不忘老朋友，歡迎新朋友的精神」，力爭使大多數客商滿意^⑪。事實上，1977年春季廣交會的出口和進口成交額都超過歷屆水平，接待的客商達16,049人次，創歷屆廣交會最高紀錄。這一年的中美貿易總額達3.1億美元，與1976年持平，但雙方經貿界人士的來往大為增加。雖然中美貿易的全面發展要等到1979年建交以後，但直接貿易的路已經基本鋪好，只要關卡一撤，就會全面暢行。

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開幕，之後在全國工業企業中掀起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運動。石油化學工業部門、煤炭部及各地區的代表提出了「要瞄準美國，趕上去，超過它」、「苦戰十年，原煤產量翻一番，達到十億噸，超過美國」等口號^⑫。這些口號雖然不切實際，但以經濟發展為目標，意味着政治掛帥的讓位。

1977年7月，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第三次重返政壇。此次復出，鄧小平吸取了1975年的教訓，不是匆忙地恢復經濟，而是先解決思想問題，於是提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主張。8月12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開，通過了新黨章，第一次寫進了實現農

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的目標，並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中國的改革開放見到了曙光。乘此東風，1977年秋季廣交會盛況空前。廣交會各團也就以下幾個問題達成共識：(1)一定要按照國際市場實際情況掌握出口商品價格；(2)一定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努力把買賣做活；(3)一定要服從黨的指導，堅持統一對外；(4)一定要在對外活動中堅持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實和求變的風氣已經初步形成。而當時也出現了某些適銷商品貨源不足，以及來賓住房緊張，安排困難的問題^④。這些問題再次將國內經濟、社會整體改革和發展的任務推到了前台，部分改革已經開始進行。在1978年的春季廣交會上，各交易團開展了來料來樣加工、定牌和中性包裝等業務，以靈活的做法擴大出口成交。1978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法〉，將來料加工和裝配業務擴大到廣交會以外的更大範圍，在廣東等沿海地區開始了經濟改革的試點。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創辦的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從思想、理論上為改革掃清道路。最終，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七 結 論

自中共建國以迄二十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是處於高度統一、以意識形態劃線、以政治目的為先的狀況。文革期間，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的政治運動中，與各行各業一樣，廣交會也在政治掛帥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隨着冷戰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不得不作出相應的調整，在70年代周恩來、鄧小平努力進行探索之下，廣交會逐漸成為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場所，按經濟規律辦事也逐漸成為共識。特別是中美關係改善帶來的對外貿易的變化，最終導致形勢轉變，中國逐漸走向改革開放，走向市場。經歷了重重波折的中國，由此步入了一個新時期，即政治上理智、經濟上變革、外交上務實的階段。這一過程至今仍未完結，但大方向已經明確，特別是經濟改革帶給人民的實惠，以及國門打開之後在視野、觀念上的衝擊，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止的。國門打開後的中國，已經不可能走回頭路，只能邁步向前，融入到世界的洪流中。廣交會既是一個實例，也是一個見證。

隨着冷戰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在1970年代周恩來、鄧小平努力進行探索之下，廣交會逐漸成為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場所，按經濟規律辦事也逐漸成為共識。

註釋

- ① 〈關於對外貿易必須統一對外的決定〉，廣東省檔案館(以下簡稱為GDA)219-2-134，頁173-74。
- ② 〈國務院批轉對外貿易部1965年全國外貿工作會議紀要〉，1965年4月12日，GDA222-2-7，頁22-30。
- ③ 〈1965年秋季交易會茶土交易團政治工作總結〉(初稿)，1965年11月26日，GDA324-2-70，頁1-5。
- ④⑥ 葉曙明：《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第三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1610；1630。
- ⑤ 〈1967年春季交易會藥材部工作方案〉，1967年4月12日，GDA324-2-93，頁56-61。

- ⑦ 李恩民：《中日民間經濟外交，1945-197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388。
- ⑧ 〈關於1968年秋季出口商品交易會人員組織問題的意見〉，1968年9月5日，GDA324-2-94，頁21-23。
- ⑨ 〈中國茶葉土產交易團1968年秋交會總結〉，1968年11月21日，GDA324-2-94，頁1-15。
- ⑩ 〈中國茶葉土產進出口總公司函寄 1969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工作方案〉，GDA324-2-97，頁5-8。
- ⑪ 〈關於改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地區）出口貿易做法情況簡報〉，GDA324-2-97，頁163-73。
- ⑫ 沈覺人主編：《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下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329。
- ⑬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全國對資出口會議紀要及具體政策」〉，附錄二：「關於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貿易的若干具體政策和做法」，1971年6月21日，GDA302-1-282，頁1-32。
- ⑭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告周總理關於工藝品出口問題的指示〉，1971年7月10日，GDA302-1-282，頁33-37。
- ⑮ 〈嚴亦峻同志傳達全國外貿工作會議發言提綱〉，GDA302-1-280，頁3-33。
- ⑯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外貿部「關於中美貿易問題」〉，1972年3月22日，GDA324-2-117，頁46-50。
- ⑰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1972年春季交易會邀請客戶掌握原則」的通知〉，1972年3月9日，GDA302-1-300，頁22-26。
- ⑱ 〈周總理指示及本團安全工作情況〉，GDA324-2-114，頁67-72。
- ⑲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外貿部「關於對美貿易問題的規定」〉，1973年3月7日，GDA302-1-330，頁40-43。
- ⑳ 〈外貿部關於放行印有「美國人民捐贈」字樣的麵粉袋的通知〉，1973年2月28日，GDA302-1-357，頁125；〈廣州海關呈外貿部覆單〉，1973年3月17日，GDA302-1-358，頁41；〈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外貿部「關於海關驗放美國進出口貨物和價購貨樣、廣告品的通知」〉，1973年10月5日，GDA302-1-357，頁82-85。
- ㉑ 〈1974年下半年西方貨幣金融形勢和主要資本主義貨幣前景估計〉，《外貿調研》，第131期，1974年9月17日，GDA324-2-129，頁51-54。
- ㉒ 對外貿易部編：《外貿簡報》，1975年第1期，1975年1月8日，GDA235-2-220，頁1-3。
- ㉓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外貿部「關於1975年改進外貿經營體制的意見」的通知〉，1974年12月20日，GDA324-2-126，頁88-93。
- ㉔ 《外貿簡報》，1975年第19期，1975年4月18日，GDA235-2-220，頁43-44。
- ㉕ 《外貿簡報》，1975年第29期，1975年6月7日，GDA235-2-220，頁69-70。
- ㉖ 《外貿簡報》，1975年第51期，1975年10月17日，GDA235-2-220，頁130-31。
- ㉗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外貿部「關於認真抓好出口商品質量」的通知〉，1975年10月29日，GDA324-2-134，頁51-55。
- ㉘ 《外貿簡報》，1975年第63期，1975年11月24日，GDA235-2-220，頁159-62。
- ㉙ 〈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外貿部「關於七六年春季廣州出口交易會的請示」〉，1976年4月20日，GDA302-1-461，頁5-12。
- ㉚ 《外貿簡報》，1977年第11期，1977年4月16日，GDA235-2-135，頁22-23。
- ㉛ 《外貿簡報》，1977年第26期，1977年5月21日，GDA235-2-135，頁55-57。
- ㉜ 《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簡報》，第49期，1977年5月4日；第57期，1977年5月7日；天津代表團特輯，1977年5月12日，GDA229-6-277。
- ㉝ 《外貿簡報》，1977年第42期，1977年10月18日，頁98-99；1977年第44期，1977年11月2日，頁103-105；1977年第49期，1977年11月28日，GDA235-2-135，頁114-18。

何 慧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著有《尼克松與中國——半個世紀的不解之緣》。